

柳宗元散文思想及其造詣發微

姚 振 黎

柳宗元文沈鬱峭拔，峻潔清新，所謂「雄深雅健，似司馬子長。」（註一）雄深者，蓋指內容；雅謂詞藻，健稱其氣勢。魏禧《日錄》論子厚文「如幽巖怪壑，鳥叫猿啼。」（註二）其長於論辯、議說、寓言、傳記、遊記，體裁衆多，題材廣泛，風格獨具。上有所承，而下有所啓。茲探究子厚散文思想及其造詣，以爲研析柳文者之參考。

壹、思想探原

一、明道尚文，允執厥中

韓柳倡爲古文，下及宋代，操觚者羣奉爲斯文不祧之大宗；（註三）二家所言「文道合一論」，爲中國文學樹立「文章之正統」觀念；文章應爲闡揚儒道教化之工具，此一觀念，影響深遠，形諸文字始見於明茅坤〈與王敬所書〉：（註四）

嘗就世之所稱正統者論之，六經者，譬則唐、虞、三王也；西京而下，韓昌黎輩，譬則由漢而唐、而宋，間及西蜀、東晉是也。

文章以古聖先賢經傳爲「取道之原」（註五），子厚羽翼昌黎，宣揚文道合一，文統卽道統。（註六）〈答韋中立書〉曰：

始吾幼且少，爲文章以辭爲工。及長，乃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，務采色，誇聲音，而以爲能也。……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。本之書以求其質，本之詩以求其恆，本之禮以求其義，本之春秋以求其斷，本之易以求其動，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參之穀梁以厲其氣，參之孟、荀以暢其支，參之莊、老以肆其端，參之國語以博其趣，參之離騷以致其幽，參之太史以著其潔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也。柳集卷三十四

既肯定先秦儒家古文，亦承認與儒家古文同時之諸子古文，且重視以先秦古文為淵源之兩漢古文，尤指司馬遷文。〈報崔黯秀才書〉論為文云：

聖人之言，期以明道，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。辭之傳於世者，必由於書，道假辭而明，辭假書而傳，要之之道而已耳。道之及，及乎物而已耳。柳集卷三十四

搦筆染翰既為明道，道之原在儒家經傳，「其歸在不出孔子」（註七），故〈答嚴厚輿論師道書〉曰：

今世固不少章句師，僕幸非其人，吾子欲之，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。柳集卷三十四

對南北朝以降煩瑣而無發明的義疏之學，極為鄙視，復對文辭陷溺、內容怪誕之作斥之曰：

凡人好辭工書者，皆病僻也。吾不幸蚤得二病，學道以來，日思砥鉞攻熨，卒不能去，纏結心腑牢甚，願斯須忘之而不克，竊嘗自毒。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，不亦惑乎！……均之二病，書字益下，而子之意又益下，則子之病又益篤。甚矣，子癖於伎也！報崔黯秀才書 柳集卷三十四

生當文壇好辭害道者甚夥之時，子厚以一己之經驗，評述好辭者每喜假道以攜辭；「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。今之後生為文，希屈馬者可得數人，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，至陸機潘岳之比，累累相望。」（註八）對為文尚辭之後生，子厚以辭為病，予以針砭。〈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〉云：

夫為一書，務富文采，不顧事實，而益之以誣怪，張之以闊誕，以炳然誘後生，而終之以僻，是猶用文錦覆陷奔也。不明而出之，則顯者衆矣。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矣。柳集卷三十一

悖離正道，馳騁文采，是捨本逐末，倒果為因，於己於人，終將沈翳而無所歸依。〈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〉云：

嘗讀國語，病其文勝而言龐，好詭以反倫，其道舛逆；而學者以其文也，咸嗜悅焉，伏膺呻吟者，至比六經，則溺其文，必信其實，是聖人之道翳也。柳集卷三十一

〈非國語後序〉復謂：

凡其繁蕪蔓衍者甚衆，背理去道，以務富其語。……越之下篇尤奇峻，而其事多雜，蓋非出於左氏。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，以彼庸蔽奇怪之語，而翻敲之，金石之，用震曜後世之耳目，而讀者莫之或非，反謂之近經，則知文者，可不

慎耶？（註九）

僅求詞采華美，聲律和諧，豈是行文之軌範；好辭工書，經時既久，影響所及，終使讀者以燕醜為寶珠，屬文之士，豈可不「羽翼夫道」。

若謂柳文唯「明道」、反對「好辭工書」，而未見其「有意窮文章」（註一〇），則謬矣！其為文學家而非哲學家，「文以明道」「取道之原」「羽翼夫道」為其文學思想之部分，〈楊評事文集後序〉云：

文之用，辭令褒貶，薄揚諷諭而已。雖其言鄙野，足以備用，然而闕其文采，固不足以竦動時聽，誇示後學，立言而朽，君子不由也。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。柳集卷二十一

秉筆之士苟能詞正而理備，言暢而意美，可謂藝成。〈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〉云：

僕之為文久矣，然心少之不務也，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，故在長安時，不以是取名譽，意欲施之事實，以輔時及物為道。自為罪人，捨恐懼則閑無事，故聊復為之。然而輔時及物之道，不可陳于今，則宜垂於後。言而不文則泥，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。柳集卷二十一

對於古代之文，尤推重西漢，已於前述，與從弟宗直搜討排比，為西漢文類，並為之敘曰：

殷周之前，其文簡而野，魏晉以降，則澁而靡，得其中者漢氏，漢氏之東，則既衰矣。當文帝時，始得賈生，明儒術，武帝尤好焉，而公孫弘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相如之徒作。風雅益盛，敷施天下，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。於是宣於詔策，達於奏議，諷於辭賦，傳於歌謠，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，四方之文章，蓋爛然矣。柳宗直西漢文類序、柳集卷二十一

西漢文得子厚青睞，實因文采燦然。其打破推尊經史、卑視文學之傳統觀念（註一一），深諳優秀之古文家，應將文學與儒學結合，方苞評曰：

子厚自述為文，皆取原於六經，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！彼言涉於道，多膚末支離，而無所歸宿。且承用諸經字義尚有未當者。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，而於諸經，特用為采色聲音之助爾。（註一二）

望溪遂謂「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」，實則子厚用於儒學之工夫，遠不及用於文學之修養；其所謂之「明道」，一是古人所講道德之道，一是古人作文的藝術之道；其文不偏於

闢道而忽文，亦不因尙文而主奇，誠所謂「羽翼夫道」矣！（註一三）

有鑒於文章既因道而貴，文章家亦因道而尊，又「言而不文則泥，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。」（註一四）〈與楊京兆憑書〉云：

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，文章士之末也。然立言存乎其中，即末而操其本，可十七八，未易忽也。……天下方理平，今之文士，咸能先理；理不一，斷於古書老生；直趨堯舜大道，孔氏之志，明而出之，又古之所難有也。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，獨采取何如耳。柳集卷三十一

雖主先道而後文，文士仍應以情辭兼顧之文章家自期；即不偏於明道，亦不倚於尙文。子厚力行此一法則；嘗參之《國語》以博其趣，悟入自得，作〈非國語序〉曰：「左氏國語，其文深宏傑異，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。」復平議《國語》：

其說多誣淫，不概於聖。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論於是非，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，本諸理，作〈非國語〉。

《國語》「誣淫」，不合中道，懼學者爲其文采所惑，而內容有所不足，作〈非國語〉六十七篇。〈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〉，亦嘗論爲文之旨，曰：

大都文以行爲本，在先誠其中。柳集卷三十四

此一允執厥中之思想，實爲柳文思想主導。〈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〉云：

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！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。其言本儒術，則迂迴茫洋，而不知其適；……吾自得友君子，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，漸染砥礪，幾乎道真。然而常欲立言垂文，則恐而不敢。今動作悖謬，以爲僂於世，身編夷人，名列囚籍，以道之窮也，而施乎事者無日，故乃挽引強爲小書，以志乎中之所得焉。柳集卷三十二

〈答周君巢書〉曰：

宗元始者講道不篤，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，用是奔竄禁錮，爲世之所詬病，……然苟守先聖之道，由大中以出，雖萬受擯弃，不更乎其內。柳集卷三十三

又〈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〉云：

大都文以行爲本，在先誠其中。其外者當先讀六經，次論語、孟軻書，皆經言；左氏、國語、莊周、屈原之辭，稍采取之；穀梁子、太史公甚峻潔，可以出入。

柳集卷三十四

「大中」意謂「大本」「大道」「正道」，即中庸所謂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」

「誠其中」即大學所謂「誠其意」。「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。」子厚論爲文，恆以「志於道」，正心誠意，行不邪僻，「勿怪，勿雜，勿務速顯。」不自欺爲主，所明之道，亦含中庸之道也。

二、否定天命，破除迷信

中國傳統政治對於政權之轉移，一直未能建立客觀法制化，致使秦漢以降，「朝代更替」「君位繼承」「宰相地位」，形成政治上之三大困局，歷二千年而不得解決。（註一五）子厚生當此一政權思想籠罩下，猶視君權神授爲欺蒙人民之工具。〈斷刑論〉結語：

古之所以言天者，蓋以愚蚩蚩者耳，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。柳集卷三
一語道破統治者之謊言。〈禮說〉柳集卷十六否定神之存在；〈天說〉柳集卷十六以爲天地均屬物質，無天命存焉：

彼上而玄者，世謂之天；下而黃者，世謂之地；渾然而中處者，世謂之元氣；寒而暑者，世謂之陰陽；是雖大，無異果蠃癘痔草木也。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，是物也，其能有報乎？蕃而息之者，其能有怒乎？天地、大果蠃也。……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？功者自功，禍者自禍。欲望其賞罰者大謬，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，愈大謬矣。

斥言天之無知；天地實無異於果蠃，爲無意志精神之物體，吾人「功者自功，禍者自禍。」天地不能賞功罰禍，天與人亦毫無感應；易言之，人之禍福咎吉由於自取，實與上天無涉。〈時令論上〉曰：

聖人之道，不窮異以爲神，不引天以爲高，利於人，備於事，如斯而已。柳集卷三
子厚以封禪爲非，且全集無一字涉及讖緯，〈貞符〉柳集卷一一文，「抑詭類，拔正類。」揮斥封禪。〈封建論〉柳集卷三指出封建之形成，乃歷史發展之客觀規律，勢也；既非聖人之意，亦非天命。

〈六逆論〉柳集卷三提出：「賤妨貴，遠間親，新間舊，雖爲理之本可也，何必曰亂。」選擇聖且賢者爲嗣君，而不應考慮出身貴賤；選擇聰明賢能者任事，而不應考慮關係親疏。此言與中唐科舉引進人才之時代需要相符，可爲進用人才之準繩。〈序棊〉柳集卷二十四析論現實環境中之貴賤問題，揭露「視其賤者而賤之，貴者而貴之」階級不平，客觀指

陳尖銳衝突，否定天命，亦可見尊重民意之思想。〈送薛存義之任序〉柳集卷二十三提出官吏乃人民公僕，應謹守官箴，斥責當時官吏「受其直」而「怠其事」，又「從而盜之」敗壞吏治，莫此為甚。稱贊薛存義為官勤謹，政績優良，不尸位素餐。

子厚既否定天命，強調事在人為，故破除迷信，〈永州龍興寺息壤記〉柳集卷二十八借「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，始之為堂也，凡持錘者盡死。」永州人以為神鬼作祟，子厚究其因，乃建堂土工多疫勞者先死，「則彼持錘者，其死於勞且疫也。」表現破除迷信之科學思想，並流露對勞役者之同情。

〈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〉柳集卷三十三以長期屈辱之貶謫生涯，「行則若帶纏索，處則若關桎梏。槁焉若斨，墮焉若璞。」猶不願隱居山澤，服食丹藥，以道鬼神等事，勸周君「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，推而大之，不為方士所惑。仕雖未達，無忘生人之患，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。」其以「君子之道」「先聖之道」否定天命，尊重民意；不信鬼神，破除迷信，故以封禪為非，亦反對符瑞，主張「受命不于天于其人，休符不于祥于其仁。」(註一六)反對符瑞迷信，此一見解、理想與態度，於中唐時期可謂難能可貴。

三、精神鬱結，借題據發

遊記散文不同於觀光指南，誠如陸機〈文賦〉所云：「課虛無以責有，叩寂寞而求音。」其中佳篇巨構，每令讀者神往。子厚遊記乃三十四至四十七歲，遭貶期間，深沈幽怨，委婉傷心之作。謫居無事，讀書寫作，較前在京都時，尤為勤奮。「居閑，益自刻苦，務記覽，為詞章，汎濫停蓄，為深博無涯涘。」(註一七)「乃少得知文章利病」，(註一八)又「頗見聖人用心，賢士君子立志之分」(註一九)，窮而益工；貶謫期間，精神鬱結，所作山水遊記或寓言託傳，其思想背景可歸納為三：

(一)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 早歲仕途得意，惹動熱中干進者，渠等未達仕宦目的，遂造謠中傷，未嘗或已，終使子厚體認世態炎涼，〈與裴埜書〉曰：

有喙有耳者，相郵傳作醜語。

而嘖罵者尚不肯已，堅然相白者無數人。柳集卷三十三

又憤悔作賦曰：

曩余志之脩駕兮，今何為此戾也？夫豈食食而盜名兮，不混同於世也！將顯身以直遂兮，衆之所宜蔽也；不擇言以危肆兮，固羣禍之際也！懲管賦、柳集卷三

〈寄京兆許孟容書〉言及參與王、韋集團，乃為「共立仁義，裨教化」以「除弊興利」，後連累被貶，有悲憤不平之氣，詞語至哀痛。〈與楊京兆書〉求歸鄉闔立室家意。身處南荒，日夜思鄉，達十三載，〈又祭崔簡旅禩歸上都文〉曰：

去爾夷方，返爾故鄉，奕奕其歸，宜樂且欣。君死而還，我生而留，遠矣殊世，曷從之遊，酌觴于座，與涕俱流。柳集卷四十一

當其生時，甚或對死者還都加以欽羨，至臨終猶慨歎「我不幸卒以謫死」(註二〇)，其辛酸委曲，可見一斑。

(二)身體不適，精神挫折 子厚遭貶，有感於「萬罪橫生，不知其端。」(註二一)長期身處「還顧泥塗備螻蟻，仰看棟梁防燕雀。」(註二二)「草中狸鼠足為患，一夕十顧驚且傷。」(註二三)之情境。謫永五年，作〈與李翰林建書〉謂：居永期間，「悶即出游，游復多恐。」涉野有蝮虺大蜂為患，近水有射工沙虱作惡，對此防不勝防之蟲虺，及暗中攻擊、公開迫害之小人與政客，誠若「囚拘圜土」，難以舒暢。身心困頓，於書信中坦言不諱，唯獨記山水與學陶詩表示對閑適之追求。蓋因淡忘痛苦，追尋新生活，目標移轉至大自然，以平息身心之怨懟。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之西山，子厚以為係當地最特出之山嶺：

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岈然窪然，若垤若穴；尺寸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遯隱。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；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為類。柳集卷二十九

實則若西山者，僅需稍高山勢，均具此景色，而子厚以為「特出」，乃因「悠悠乎與灑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。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。」得西山靈秀之盪滌；凝心識之紛馳，釋形骸之愛執，得返性真之本然，而與萬化復合為一，字裏行間，一片靜寂幽闊。子厚欲從大自然中覓一異於往昔之生活方式，乃其作山水遊記之最終寄託。而其長才不展，貶竄南荒，心情至為悲鬱，無一日不思故土，絕無樂事可言，故以冷寂之心，得遇幽冷之境。正如茫茫人海，無一知音；「縱心獨往，一無所依藉。」(註二四)忽遇一同病相憐之人，於悲傷抑鬱中，得少許安慰，姑假此一時之慰藉，忘羈旅之悲憂。然則此樂也，豈由衷之樂歟？亦涕淚之中暫展愁眉。(註二五)故自然之嫣紅姹紫，不見於子厚遊記，而滿地冰霜，凜冽幽

鬱，則隨處可見。(註二六)〈鈞澗潭西小丘記〉：

清冷之狀與目謀，澹澹之聲與耳謀，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，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。

柳集卷
二十九

〈小石潭記〉：

坐潭上，四面竹樹環合，寂寥無人。悽神寒骨，悄愴幽邃。以其境過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記之而去。柳集卷
二十九

至若〈鈞澗潭記〉以幽冷之境，興悽愴之情；〈小丘記〉以棄擲之地，比放逐之臣，其結尾一用樂字，一用賀字，皆以權辭寫哀怨，蓋以反筆托正意，使人於言外得之，彌覺其愴惻。子厚自述：

自余為僇人，恆惴慄。

以此心境行文，遣辭用字極少朗耀鮮艷之色彩。〈邕州馬退山茅亭記〉寫得純古淡泊，色色俱與茅亭相稱，無一筆艷麗。〈袁家渴記〉：「粉紅駭綠，蒼勃香氣。」兩句，猶如冰山中之一朵春花，益顯冷艷生峭。

(三)思想內斂，強顏歡笑 子厚敬謹內含之風格，由其〈答韋中立書〉自道為文途徑，可窺一二：

故吾每為文章，未嘗敢以輕心掉之，懼其剽而不留也；未嘗敢以怠心易之，懼其弛而不嚴也；未嘗敢以昏氣出之，懼其味沒而雜也；未嘗敢以矜氣作之，懼其僂蹇而驕也。

輕、怠之心，僂蹇而驕之氣，均為子厚所懼，且不特立獨行之人格特質，僅以「為人師」與「領導文學改革」二事為例，子厚並非不願為，實乃不敢為。嘗謂：

言道講古，窮文辭以為師，則固吾屬事。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，故又不為人師。人之所見有同異，吾子無以韓責我。答嚴厚輿論師道書
、柳集卷三十四

僕避師名久矣。……其所不樂為者，非以師為非，弟子為罪也；有兩事，故不能：自視以為不足為，一也；世久無師弟子，決為之，且見非，且見罪，懼而不為，二也。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
、柳集卷三十四

序書云：欲相師。僕道不篤，業甚淺近，環顧其中，未見可師者；雖嘗好言論，為文章，甚不自是也。……敢為吾子師乎？孟子稱「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」。由魏晉氏以下，人益不事師，今之世不聞有師，有輒譏笑之，以為狂人。獨韓愈奮

不顧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後學，作師說，因抗顏而為師。愈以是得狂名。

答韋中立論師道書
、柳集卷三十四

在謫居以前或謫居後之長期憂患生活中，子厚對改革文風、領導文壇之熱情，未嘗稍減；對後進之士，亦「願悉陳中所得者」，而「衡、湘以南，為進士者，皆以子厚為師。」（註二七）終以「不敢銜怪于羣目，以召閭取怒。」未建立師弟子關係。〈答韋珩承韓愈相推以文墨書〉一書，雖韓愈與來學者期待子厚領導改革文風，作桴鼓之應。柳集卷三十四子厚亦有此意，〈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〉曰：

吾在京都時，好以文寵後輩。由吾文知名者，亦為不少焉。柳集卷三十四

然其指示文學改革之方向、達成文學改革之願望，均不似昌黎堅決與勇於自信。既無昌黎之膽識，唯願「取其實而去其名」，此一敬謹內斂之特質，在感情、生活遇有煩惱、痛苦時，較不易化解，是故「嬉笑之怒，甚乎裂眚；長歌之悲，過乎慟哭。」對賀者、柳集卷十四心境難以開闊，遂如〈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〉所云：「廢為孤囚，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。」子厚敬謹護衛心疆創口，除消極融一己於大自然景物，更積極掙扎求生意志，若隱若現於山嵐水霧之中，前者遂有〈鈞鉤潭記〉之「樂居夷而忘故土」、〈鈞鉤潭西小丘記〉之「而我與深源、克己，獨喜得之。」〈小石城山記〉之「嘉樹美箭，益奇而堅。」不生於中州，却在夷狄，造物者之安排，實為冥冥中安慰受屈辱之賢人。後者終見〈愚溪詩序〉〈愚溪對〉，甚或〈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〉之強顏歡笑。

四、篤信佛老，統合儒釋

韓愈以辟佛老為己仕，子厚則以浮屠「往往與論語合」（註二八）復譏昌黎「所罪者迹也」，只見佛家迷信，未見佛教義理，且佛徒不爭名利，淡泊無所求，其言論猶勝莊墨申韓，「忿其外而遺其中，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。」

何寄澎氏〈唐代古文家與佛教之關係〉一文謂：子厚信佛，世所熟知，集中六七兩卷，均和尚碑。又〈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〉柳集卷三十五謂釋氏與孔子同道，「皆有以會其趣」，意欲統合儒、釋，溝通二教。〈送琛上人南遊序〉柳集卷三十五開宗明義即謂：「佛之跡去乎世久矣，然而其道則備矣。」〈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〉柳集卷三十五云：「吾自幼好佛，求其道，積三十年，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，於零陵吾獨有得焉。」〈永州龍興寺西軒記〉柳集卷三十八亦云：「余知釋氏之道且久。」則其頗以深造佛道自許。且於佛學之悟入自得，最

重中道(註二九)。所謂中道，即八正道——正見、正思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勤、正念、正定。由此八正道以修行，即可完成戒、定、慧三學，而證入涅槃。是即子厚所云：「法之至莫尚乎般若，經之大莫極乎涅槃。」(註三〇)〈南嶽彌陀和尚碑〉云：

凡化人，立中道而教之權，俾得以疾至。故示專念、書塗巷、刻谿石，不勤誘掖，以援于下。不求而道備、不言而物成。……銘曰：公之率衆峻以容，公之立誠教其中。柳集卷六

〈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〉云：

嗚呼！佛道逾遠，異端競起，爲天臺大師爲得其說。和尚紹承本統，以順中道，凡受教者，不失其宗。柳集卷六

子厚對二和尚之推崇，皆因其能順中道而行，立中道而教。又嘗將儒佛並舉，〈大明和尚碑〉：

備以禮立仁義，無之則壞；佛以律持定慧，去之則喪。是故離禮於仁義者，不可與言儒；異律於定慧者，不可與言佛。柳集卷七

是會通禮與律、仁義與定慧也。又〈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〉云：

其道以無爲有，以空洞爲實，以廣大不蕩爲歸；其教人，始以性善，終以性善，不假耘鋤，本其靜矣。柳集卷六

意將禪宗與儒家之思想、經典相結合。(註三一)故〈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〉柳集卷二十五乃稱「眞乘法印與儒典並用，而人知嚮方。」又祝文暢「將統合儒釋，宜滌疑滯。」子厚爲統合儒釋，於〈送僧浩初序〉曰：

浮圖誠有不可斥者，往往與易、論語合。誠樂之，其於性情爽然，不與孔子異道。……雖聖人復生，不可得而斥也。柳集卷二十五

〈永州龍興寺西軒記〉曰：

余知釋氏之道且久。

其對佛法之體認，統合儒釋二家之見解，放諸唐代古文家，於佛理最有造詣者，非子厚莫屬。又元和四年（西元八〇九）在永州作〈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〉柳集卷二十五：

余觀老子，亦孔子之異流也，不得以相抗。

其主張融儒學、佛老於一爐，對學術之客觀態度，非韓愈所能及。(註三二)

貳、散文造詣

柳文之蒐集與流傳，可謂完備。茲依《四部叢刊》影元本《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》四十三卷，復有別集、外集，卷帙可稱繁富，其中除奏狀、古今詩之外，古文作品不下數百篇，故歷來選家，如明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、清沈德潛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，雖取捨不同，出入互見，然擇其尤為精粹者，可別為論辯、議說、寓言傳記、書牘贈序祭誄、山水遊記等類，並就各類中代表作品，予以詮釋，略為品評，以見其散文造詣，俾資探究柳文思想。

一、論辯雄俊，識見偉特

論辯文者，說理之文也。《文心雕龍·論說》曰：「論也者，彌綸羣言，而精研一理者也。」其體制與寫作要領為：

原夫論之為體，所以辯正然否；窮於有數，迫於無形，鑽堅求通，鈎深取極；乃百慮之筌蹄，萬事之權衡也。

論辯文體之本質，既為明辯是非，故貴在說理明暢，文辭簡要，氣勢充沛，情理兼備，切忌煩瑣枝蔓。子厚〈封建論〉柳集卷三剖析古代分封制度，領土係「繼世而理」，致使「世大夫世食祿邑」，形成「不肖居上，賢者居下」，劣幣驅逐良幣之反淘汰現象。子厚據古驗今，探原究委，抨擊封建制終將出現尾大不掉之勢，斥責門閥世族之腐朽，諸侯王逼上病民、殘民以逞，徒然加速分封王朝之衰落以至覆亡。全文立一勢字以為眼目，不惟識見偉特，且辯論雄俊，辭理廉悍勁古，《東坡志林》論封建曰：「昔之論封建者，……宗元之論出，而諸子之論廢矣。雖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。」（註三三）子厚此論，直與〈過秦〉抗席，實為萬世法也。

〈辯侵伐論〉柳集卷三說明用兵固不得泥於古，然聖人之意不可悖也。苟非以生道殺人，雖死無怨；反之，殺者其何可以言兵，未能以生道殺人而言兵，皆違天而戕人也，違天而戕人，敗固禍，而勝亦禍，古可鑒矣。宗元此文，可作《左傳》義疏。（註三四）

〈六逆論〉柳集卷三所謂賤妨貴、遠間親、新間舊三事，不惟不斥為亂源，且直據為理本，說理能縱橫如意。

〈桐葉封弟辯〉柳集卷四辯駁《呂氏春秋》與《說苑》記述周公史實之荒謬，以「吾意不然」一語駁倒。全篇析論王者之德行，若未得其當，雖十易之不為病；然於其當者，不可使易也。前幅連設數層反駁，後幅連下數層斷案，俱以理勝，非尚口舌便便，可謂深明大體之言。

子厚論辯文有一共同之結構型式，即立案、翻案、結案三段式。首言議論辯駁之情事，以為文章綱領，此即所謂「立案」；次將所提情事，予以翻駁或論辯，此即所謂之「翻案」；末則總結上文翻駁之結果，此即所謂之「結案」，亦為文章結論，揆諸〈與韓愈論史官書〉、〈桐葉封弟辯〉之結構，皆然。（註三五）

〈文概〉引朱子曰：「韓退之議論正，規模闊大，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。」劉熙載謂：「此原專指柳州〈論鶡冠子〉等篇。」子厚論辯文如〈辯鶡冠子〉、〈辯列子〉、〈辯文子〉、〈辯鬼谷子〉、〈辯晏子春秋〉、〈辯亢倉子〉等，或辯成書年代，或辯作者真偽，或辯該書價值，寫法並不千篇一律，而能各具特色。如〈論語辯〉辯論語作者及堯曰章記堯舜、成湯語之由來。

一般言之，柳文以「辯」名篇者，較重破他，而「論」則更重立己；其辯衡情度理，逐層翻駁，其論體勢雄俊，辭理廉悍。

二、議說明晰，森然法戒

《文心雕龍·議對》：「文以辨潔為能，不以繁縟為巧；事以明覈為美，不以環隱為奇。」議說文字應以說理清晰，合於論理，為綱領之大要。

唐宋古文家所作駁議文，以子厚〈駁復讎議〉柳集卷四最著。此文作於任職禮部員外郎時，為駁一不合理之法律。溯至武后時，有名徐元慶者，為報父仇而殺人，後自首。彼時諫官陳子昂以為：應以殺人罪判徐處死；然為父報仇，合於孝義，故死刑後復「旌其間」以表彰之，子厚不同意此項立法。首段總挈大意，以下承首段，逐層分說，先以誅其可旌，旌其可誅，兩面互翻，復以推原之筆，透出主意，通篇脈絡，有綱有目，末尾揭出本意，前呼後應，井然有序，中心突出，主從分明，其組織布局，無論是過渡轉折，破題結尾，均能原始要終，首尾一體。

〈晉文公問守原議〉柳集卷四自晉文公定周襄王於郊，王賜以原地，晉侯難其守，問寺人勃鞞；對曰：「昔趙衰以壺飧從行，餒而弗食，可使守原！」趙衰之賢足以守原，勃

觀之對亦非失學，然偶幸以不失，舉而聽之，後有失學，亦幾從而信之矣，其利在一時，禍將在數世，漸何可長也，論失政之端，明斥晉文，實隱譏德宗之遷政於闍人，暢論流弊所及，於是景監弘石之禍，皆晉文兆之。爲探本索原之作，以資文公有山岳不動之概。文極謹嚴，森然法戒。(註三六)

〈天說〉^{柳集卷十六}係因韓愈之言，而與之申辯也。蓋昌黎謂天爲有知，其倒行賞罰，乃咎吾人不應鑿渾沌之竅而施以民智，故天罰之。子厚藐天之無知，並謂不信天有賞罰，凡爲賞爲罰，均自吾人目中所見，而天實不知，隱言己身遭貶，與天無涉，蓋天地渾沌之氣，於功不知報，於害不知禍，其偶然得福，偶然得禍，天實一切不管，此與「聖人畏天命」之說大歧，然行文奇詭，言人所未嘗言。

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記友人徐敦立言：「子厚〈非國語〉之作，正由平日法《國語》爲文章，看得熟，故多見其疵病。」(註三七)〈非國語〉^{柳集別集六十七則}，篇篇借題發揮，抨擊時政，筆鋒銳利，嚴密具邏輯性，子厚對《國語》一書，能入能出(註三八)，所表現懷疑求真之治學態度，身當中唐時期，誠屬難得。

三、諷世峭刻，深寄憤慨

先秦寓言，以說理爲主，是故韓非子寓言爲明其集「法、術、勢」大成之法治思想；莊子寓言爲宣揚逍遙自適、無爲齊物之道家理論；兩漢魏晉南北朝之寓言承襲先秦，未有特出發展。迨至子厚，生當唐室陵夷、民生凋敝之時，秉持「生人之道」^{乘桴說、柳集卷十六}，輔弼「一明大道，施于人世」^{貞符序、柳集卷二}之善政，惜乎「大中之所宜」^{懲符賦、柳集卷二}的政治理想，未得實踐，爲揭露社會黑暗，諷刺腐朽勢力，從而發揮諷刺特長，所作託諷之文，非爲某人記事立傳，僅爲揭示問題，說明道理，雖受莊子影響，不似莊之寓言說理。茲依陳蒲清氏所著《中國古代寓言史》一書，析論柳宗元寓言內容，大抵有三：

(一)針對現實，鞭撻照暗暴虐與腐敗真象 藩鎮割據爲中唐最嚴重之社會問題。《新唐書·兵志》曰：「大者連州十餘，小者猶兼三四，故兵驕則逐帥，帥疆則叛上。」(註三九)驕縱橫暴，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。子厚作〈設漁者對智伯〉^{柳集卷十四}經由歷史人物智伯，借大鯨諷刺殘暴之軍閥，荼毒人民，並預言軍閥下場。〈黜說〉^{柳集卷十六}諷刺投機取巧「不善內而恃外」者，進而對唐朝「以藩制藩」策略，提出勸戒。〈李赤傳〉^{柳集卷十七}諷刺狂妄自大、好惡顛倒、執迷不悟之「假名士」。〈罵尸蟲文〉^{柳集卷十六}以爲非作歹之宦

官與官僚比作人體內之「陰穢小蟲」，其罪行猶得皇帝之包庇與縱容。〈蝨蝨傳〉^{柳集卷十七}反映中唐時官場統治者貪婪成性、利欲薰心之醜態，含蓄蘊藉。〈哀溺文〉^{柳集卷十八}與〈蝨蝨傳〉同一命意；雷永民善泳，乃以腰千錢之故，不舍而溺，諷刺貪婪富人，「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泥者乎？」〈永州鐵爐步志〉^{柳集卷二十八}諷刺中唐時只看門第，不辨賢愚之門閥與世襲制度。〈鞭賈〉^{柳集卷三十}說明朝廷用人不當，助長獵取高位之官僚，戒取士者毋皮相，亦戒倖進者以爭道相踉之會折爲五六，良可懼以思也。

(二)傷痛失志，反映政治革新失敗之悲憤 〈宋清傳〉^{柳集卷十七}敘述長安藥商宋清，居藥四十年，以義爲利，無論相識與否，皆可以券取藥；清不索值，而卒以富，反觀〈與京兆許孟容書〉：「伏念得罪來五年，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。」人情冷暖，則〈宋清傳〉之作，實有感而發。〈謫龍說〉^{柳集卷十六}爲貶謫永州後，爲人所侵辱，有感之作。藉被貶謫之龍女自喻，憧憬有朝一日「化爲白龍，回翔登天。」實現政治抱負。〈憎王孫文〉^{柳集卷十八}以猿與王孫二者品德相反之動物；前者互愛互助，謙恭有禮，後者互相傾軋，粗暴無禮；以己所屬之政治集團比作猿羣，政敵之殘酷比作王孫羣，猿與王孫「居異山，德異性，不能相容。」贊揚革新勢力之清廉自守，福國利民；守舊勢力貪婪兇狠，禍國殃民。能曲狀小物，盡其微旨，重申子厚以國計民生爲重，堅持政治革新之正義主張，寫來幽渺峭厲。〈三戒〉^{柳集卷十九}以臨江之糜喻恃寵小人，文不涉人而但言糜，讀之灼然自了其用意所在。永某氏之鼠慨歎權臣當國，引用黨徒，一旦勢敗，則依草附木。黔之驢喻全身以遠禍。藉糜之可憐、驢之可笑、鼠之可憎，指出「不推巴之本」，謹記王叔文政治革新失敗之教訓，並對強暴之統治者與其幫兇，予以鞭撻。

(三)揭發理想，發表政治主張 鑒於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，而不知報，作〈鶴說〉^{柳集卷十六}主報施言。正意尚不吐露，中間神光湧見處在無位號爵祿之欲，里閭親朋戚友之愛，著一無字，覺罵世之言，全不坐實，歸入出乎轂卵句，人不如鳥，在有意無意間點清，工夫又全在上句一個器字，言毛翮之物，原不爲仁義之器，然無欲，無其器，而有其道，則爲人者媿死矣。復舉梟鼠爲例，說明人不知報，則不若鶴鼠。(註四〇)〈捕蛇者說〉^{柳集卷十六}源自《禮記·檀弓下》苛政猛於虎，針對朝廷賦稅煩苛，民生愁苦，而永州居民蔣姓爲苟安旦夕，以捕毒蛇充貢品，子厚身爲逐臣，有感其事，不敢爲民請命，因爲文以諷。俗吏之殃民，躍然紙上。〈種樹郭橐駝傳〉^{柳集卷十七}主張與民休息；陳述政見，痛快淋漓。〈有蠖蛇文〉^{柳集卷十八}以毒蛇長於樹林，人生於屋室，各不相犯，壞人只宜

隔離，良爲仁者之言，兼具道家思想。〈梓人傳〉柳集卷十七借梓人以發其端，由賓入主，說明爲相之理，觀人風者，得不有所醒悟？

子厚寓言託諷事理，揭示時弊，其精微指歸，不僅關係個人之品德志業，順宗君臣之名節作爲，更涉及民生疾苦、社會阨隘，乃至探究唐室覆亡之根本。(註四一)其藝術成就有二：⊖獨立成篇，各自名篇，形式多樣，長短不一。甚或以騷體寫寓言者，計有〈罵尸蟲文〉柳集卷十八、〈憎王孫文〉柳集卷十八、〈辨伏神文〉柳集卷十八、〈哀溺文〉柳集卷十八。⊖反映社會，觀察入微，或人或物，描繪精確。如〈鞭賈〉柳集卷三十中不識貨之富家子、詐騙牟利之市儈。〈黔之驢〉中老虎與驢之接觸，可謂簡鍊犀利。(註四二)

四、信言懇摯，相知涵容

明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：「按：昔臣僚敷奏，朋舊往復，皆總曰書。」(註四三)書者，古代書信之總名。《文心雕龍·書記》將書牘、牋記聯合成詞，並省稱之。彥和曰：「書者，舒也，舒布其言，陳之簡牘。」書牘原爲盡言，以見一己之風範文采，初唐文風仍繼六朝餘緒，書牘無大變化，至韓柳倡古文運動，書牘亦別開生面，內容豐富；或議時政，或論學術，或評詩文，或授學業，或抒際遇，或諭親朋，言之有物，吐露衷情。

子厚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〉柳集卷三十四言已不敢爲人師之因，並暢論治學爲文之法。〈與友人論文書〉柳集卷三十三敘文人之遇及爲文流弊。意蓋輕藐流輩之不知文，通篇均未言作文之法，然切指時弊，以爲能去弊病，則文體自趨於正。

元和四年（八〇九）、爲永州山人元集虛作序送行，有〈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〉柳集卷三十五，謂釋氏與孔子同，「皆有以會其趣」，引發韓柳第一次論辯，後作〈送僧浩初序〉以辨之。元和九年（八一四）作〈與韓愈論史官書〉，詞意嚴切，爲韓柳第二次論辯。(註四四)子厚以爲退之身兼史職，應本褒貶之責，堅持真理，伸張正義，既畏天刑人禍，則不宜領職，故劈頭說破。苟能恃直恃道，則一無所恐，語含推崇與慰勉之意，見得朋友相知之深，故責望如此，正氣凜然。退之終因子厚言之成理，察納雅言，對宦官之惡行，筆伐不遺餘力，無畏懼刑禍之心，於元和十年修成《順宗實錄》五卷。明董其昌對此事評論曰：「昌黎如何人物，書中可見，而有時乎爲利害所惑，則河東之辨駁，不能已者。古人相知之深，洵未嘗避其所譏。」(註四五)

子厚對友朋後進昌言無忌，於其書信可知。〈與李睦州論服氣書〉柳集卷三十三對服氣之妄誕無驗，痛下針砭。又恐不信，於是廣引多人，以明己之直諫，萬非語虛，足證服氣之不是，消極指陳外，並積極勸其極五味之適，致五臟之安，是文中本意。

〈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〉柳集卷三十三以王參元才高而為財累之事實，幸失火「將吊而更賀」，有深識，有至理，誠乃奇情恣筆。書中始駭、中疑、終喜；不火不足以表參元，不火不盡，不足以大表參元，且揭露並抨擊社會弊病，筆調輕鬆，快語驚人，諛諧中不乏沉痛之意，言喜、言賀，乃文章正意所在，奇文奇論，而入情入理。

〈與李翰林建書〉柳集卷三十寫謫居永州苦況，悽惻悲愴，動人矜憫，茅坤謂子厚永州書信，「多悲愴嗚咽之音，而其辭氣環詭跌宕，譬之聽胡笳、聞塞曲，令人斷腸者也。」(註四六)對此苦況，子厚自道：「今僕雖羸餒，亦甘如飴矣。」政治上既無所作為，小人政客之落阱下石，愁悶困苦之中，子厚思想開展，明乎「賢者不得志於今，必取貴於後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。」寄許京兆孟容書、柳集卷三十遂發憤著書以「明道」，可見其用世之心及身處逆境而不屈服。

方苞謂子厚在永州書信之風格，「不過如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」，實屬表相之論，蓋子厚書牘，除為其生活境遇之反映，涉筆吐實，且關懷師友，借言警策；嘉獎掖後進，誠如昌黎所云(註四七)，又自道：「吾在京都時，好以文寵後輩。後輩由吾知名者，亦為不少焉。」答貢士廖方論文、柳集卷三十四杜溫夫自荆至柳，為謁見子厚，得其贊賞，以邀聲譽，子厚作〈答杜溫夫書〉柳集卷三十四，嚴肅指陳其文之病，並述一己寫作體會，要求杜端正態度，學習寫作之基本知識；當掌握助詞用法，加強氣質修養，此一關心後學，直指其病之諄諄教誨，令人感佩。

子厚與師友相知涵容，亦可由贈序、碑誌、祭誄文中得知。其贈序一門，如〈送薛存義之任序〉柳集卷三十三，真樸有見解，提出官吏職責，乃「民之役，非以役民。」實漢唐宋明諸老所未能及者。〈楊評事文集後序〉柳集卷三十三追悼楊評事之早夭，故不能肩隨陳子昂，文不過譽，言至得體。

〈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〉柳集卷三十三凌君於元和元年，與子厚同貶，此誌為子厚在永州時作，述凌君流貶，母亡弟喪，歸怨於報應之無憑，此子厚思想本色。〈故襄陽丞趙君墓誌〉柳集卷三十三非銘趙君，直志其子之孝，造句怪特古鬱，布局尤奇，所記雖猥瑣，行文卻莊重。〈祭呂衡州溫文〉柳集卷三十四以呂溫與子厚同貶，道不得行，功不得施，「友

朋凋喪，志業殆絕」之悲憤，抒發謫官傷逝之憤懣。(註四八)

《文心雕龍·誄碑》：「誄者，累也，累其德行，旌之不朽也。」「誄」，用於德高望重之死者，累列其生前功伐，以致悼念。子厚〈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公誄〉係為呂和叔作也。和叔謫衡州，竟瘞葬於江陵之野，柳氏悲其同貶，憑弔生平，哀其末路，經蘇往復之中，却見抗爽。

五、雜記新穎，辭潔體清

《文心雕龍·書記》曰：「夫書記廣大，衣被事體，筆削雜名，古今多品。」將所有形諸文字而難以歸屬之雜品文字，均置於書記類。又謂：「記之言志，進己志也。」明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亦云：「記者，蓋所以備不忘。」(註四九)後人僅留以「記」名篇之文字，稱曰雜記文。若子厚之雜記文，或記台閣名勝，或為山水遊記；或書畫雜物，或人事雜記；或描寫抒情，或敘述議論，無不以意運辭，以辭生意。

〈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〉柳集卷二十首敘南池之勝，中敘遊燕之樂，末從歡戚二字生情，通篇雕琢修辭，惟其流利，能化去雕琢之痕，故琢句生新，斯為可貴。

〈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〉柳集卷二十七因題中有萬石二字，遂從此生情，運用典故，以寓頌美之意，首曰怪石，中敘亭之勝，末曰萬石典故，歸入頌禱意。

〈永州韋使君新堂記〉柳集卷二十七起筆翻騰，陡然而來，振起全局，有高屋建瓴之勢，結尾迴應前文，起結互應，收束全局，全篇作意在一因字，末段見公之作，知公之志，皆從韋公構造新堂生情，而與因俗成化，除殘佑仁，廢貪立廉，家無戶曉等語，適相印合。起句「將為穹谷嵒巖淵池於郊邑之中」，其穹字、嵒字、淵字，皆形容物象者也，又「邇延野綠，遠遊天碧。」其延字、遊字，皆摹寫光景者也。遣辭非不雕琢，然均妙造自然，連用四疊，尤極流利之致。(註五〇)本篇與〈萬石亭記〉同言人功不勝天然，原屬尋常用意，然子厚無中生有，預卜韋公後來之政績，並欲用示後來，枯窘之題，能展拓如是，筆筆生新，非大家莫能鼓。

〈零陵郡復乳穴記〉柳集卷二十八以是祥、非祥為一篇主意；謠者之祥為怪，穴人之非祥為祥，而歸重於政之善，通篇選義考辭，按部就班，以意運辭，一絲不辭，故辭潔而體清。

〈永州龍興寺東丘記〉柳集卷二十八通篇以曠字、奧字並重，首段曠奧並提，中段從曠字折

到奧字，後路用韻語說奧如之勝，中間如「俛入綠綈，幽蔭蒼蔚」等句，皆極鍊字之妙，其以辭生意，足以狀物情，寫物景，使人讀之，意遠情怡，與物情物景相會。（註五一）

至若〈永州龍興寺西軒記〉柳集卷三十八則主曠而不主奧，收筆用佛氏之言，捨大闢爲光明，尤稱開軒之作。

〈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〉柳集卷二十七文中用字，或譬喻、或形容。如中間言山，則曰「尾蟠荒陬，首注大溪。」尾蟠、首注，皆譬喻字也。又如「馳奔雲瀛」一句，馳字、雲字爲譬喻字，奔字、瀛字爲形容字，用字極妙，文亦雋逸，有情有文。

〈道州薛伯高毀鼻亭神記〉柳集卷三十八敘伯高之果毅，力毀淫詞，卻寫得生氣勃然。〈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〉柳集卷二十七美楊公，兼美戴氏，語易偏重，頗難著筆，子厚言戴氏行高、文峻、道懋，則離世之志，必將不果，復迴顧楊公之得人，殊爲記中之極筆。

文章爲日新之物，不獨意要新，詞要新，用字亦要新，此卽陳言務去。子厚以意鍊字；有意自能生新。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柳集卷二十九若在庸手，敘西山，則林壑泉石；敘宴遊，則賓朋絲竹，題首始字，反易略過，子厚偏於此著眼，全文自首至末，落到「始」字，造意新穎，與衆不同。〈鈞鋸潭西小丘記〉柳集卷二十九借小丘以寄慨，結句「所以賀茲丘之遭也」，神韻悠然，令人味之不盡。其形容石狀，有云「其嶽然相累而下」，又云「其衝然角列而上」，嶽字、衝字，皆假山與物之衝出者以形容也。

永州爲一荒昧不闢之區，亭台山水，若非極力描摹，山容水態，本不易流傳於藝苑，而子厚山水之記尤爲精絕，雖大同小異之景觀，然各有經營，其刻畫山水之美，無論草木山石，萬物百態，均清瑩秀澈，纖塵不染，具鏘鳴金石之聲。〈愚溪詩序〉曰：「漱滌萬物，牢籠百態。」實若自喻文境。

叁、結 語

柳文影響後世文風，既深且遠。其明道尚辭，允執厥中之儒家思想；尊重民意，破除迷信之非命持論；統合儒釋，篤信佛老，會通各家，取精用弘，使後世文家或自其思想，或自其寫作藝巧汲取學習。若歐陽脩《新五代史·伶官傳序》開宗明義曰：「盛衰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！」與子厚〈天說〉人勝於天之思想契合。〈醉翁亭記〉行文結構，空間自偌大至縮小，內容自包羅萬象的山水之樂、百姓之樂，至太守內心妙

不可言之樂；此一由宏大至精微之凝聚，與〈遊黃溪記〉^{柳集卷二十九}由大而小，層層收縮，集中一點之寫作方法同。（註五二）梅堯臣作〈乞巧賦〉，^{宛陵先生集卷六十一}以散文出之，雖不似子厚〈乞巧文〉之用騷體，然作意與景物假借向天孫乞巧，曲折表白「大拙」不佞之品德，揭露世人巧詐之醜態，皆效子厚。蘇軾作〈河豚〉〈烏賊魚〉二說，均直接模仿子厚〈三戒〉。〈非國語〉六十七則表現懷疑求真之治學態度，開啓有宋疑經之風。

降至明清，如公安三袁與徐霞客學柳文，然袁得其峭而近蕪，徐得其奇而頗襍，故不及子厚。民國以後，寫山水遊記者，若郁達夫得其腴，易君左得其趣。（註五三）是知子厚散文之思想與造詣，影響迄今。而其遭貶抑鬱之心境，發應爲文，雖見憤懣之情，亦有化解之意，爲身處今日多元化社會之芸芸衆生所感佩。

是故退之扶導聖教，剷除異端，是其所長；至若祖述堯舜，憲章騷、雅，上傳三古，下籠百氏，橫行闕視於綴述之場，子厚一人而已。（註五四）

附 註

註 一：劉禹錫、唐柳先生文集序。見《增廣註釋音辨柳先生集》（以下簡稱柳集）、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。

註 二：魏禧、日錄、第二卷、雜說。見《魏叔子文集》、第七冊、頁三〇〇九、商務印書館印行。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初版。

註 三：錢穆、讀柳宗元集。新亞學報、第三卷、第二期。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初版。

註 四：馮書耕、金倪千著、《古文通論》上篇、第二章、立言所向、頁一六五～二〇五。國立編輯館印行。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三版。

註 五：柳集卷三十四、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。

註 六：何寄澎《唐宋古文新探》頁三五二、唐宋古文運動中的文統觀。大安出版社、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印行。

註 七：柳集卷三十四、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。

註 八：柳集卷三十、與楊京兆憑書。

註 九：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別集下、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。

註一〇：同註八。

註一一：蕭統、文選序：「姬公之籍，孔氏之書，與日月俱懸，鬼神爭輿，……老、莊之作，管、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。」羣經諸子不列於文學領域。唯子厚將五經

柳宗元散文思想及其造詣發微

- 子史視爲文學看待。見《中國歷代文論選》上册、頁四六一。木鐸出版社。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印行。
- 註一二：方望溪先生文集卷五、書柳文後。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。
- 註一三：郭紹虞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上卷、第五篇、隋唐五代、頁二五七。
- 註一四：柳集卷三十一、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。
- 註一五：蔡仁厚《新儒家的精神方向》、頁二三～二四。學生書局、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初版。
- 註一六：柳集卷一、貞符。
- 註一七：韓愈、柳子厚墓誌銘。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第七卷、頁二九五。華正書局。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初版。
- 註一八：同註八。
- 註一九：柳集卷三十、與李翰林建書。
- 註二〇：同註一。
- 註二一：柳集卷三十、與蕭翰林儉書。
- 註二二：柳集卷四十三、跋烏詞。
- 註二三：柳集卷四十三、籠鷹詞。
- 註二四：同註一二。
- 註二五：王禮卿《歷代文約選詳評》、册一、頁三五七。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。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再版。
- 註二六：劉文獻、柳宗元的遊記。文學雜誌六卷三期。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出版。
- 註二七：同註一七。
- 註二八：柳集卷二十五、送僧浩初序。
- 註二九：同註六、頁二二、唐代古文家與佛教之關係。
- 註三〇：柳集卷二十五、送琛上人南遊序。
- 註三一：蘇文擢、柳宗元與佛教之關係。大陸雜誌五十五卷、第五期。
- 註三二：黃雲眉《韓愈柳宗元文學評價》、頁一三四。柳宗元文學的評價。山東人民出版社、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版。
- 註三三：東坡志林、卷五「秦廢封建」條。木鐸出版社印行、頁一〇四、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初版。
- 註三四：清高宗御選、唐宋文醇、上册、卷十六、頁一〇〇。臺灣中華書局印行。民國五十八年二月臺一版。
- 註三五：羅聯添、柳宗元山水記與論辯文的分析。中國文學講話內、唐代文學。巨流圖書公司、

頁三五六。

註三六：查猛濟編註、唐宋散文選。頁四四。正中書局印行、民國六十八年二月臺八版。

註三七：陸游、老學庵筆記、卷十、木鐸出版社印行、頁一二七、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初版。

註三八：周振甫、文章例話、「求出入」條。蒲公英出版社、頁六〇～六二。

註三九：新唐書、卷五十、兵志。鼎文書局、冊二、頁一三二九。

註四〇：林紓、韓柳文研究法、頁九三。廣文書局、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三版。

註四一：段醒民、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、敘論、頁三。文津出版社、民國七十四年七月。

註四二：陳蒲清、中國古代寓言史、第四章、第二一節、諷刺寓言的瑰寶——柳宗元寓言。湖南教育出版社、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。頁一八二～一九〇。

註四三：吳訥、文章辨體序說、頁四一。長安出版社、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。

註四四：羅聯添、韓愈研究、三、韓愈交遊、頁一六五～一七一。學生書局、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增訂再版。

註四五：《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》評柳文。

註四六：同註四五。

註四七：同註一七。「率常屈其座人，名聲大振，一時皆慕與之交，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，交口薦譽之。」

註四八：同註四〇、頁一二七。

註四九：同註四三、頁四二。

註五〇：宋文蔚、文法津梁、上册、「起結互應」條。頁一〇八。蘭臺書局印行、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再版。

註五一：同註四〇、頁一一七。

註五二：賈德民、古代抒情散文鑑賞集、頁二二四。國文天地社、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初版。

註五三：王世昭、中國文人新論、第十七篇、山水高手柳宗元。河洛圖書出版社、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。

註五四：劉熙載、藝概、卷一、文概。廣文書局。